

钱基博《国学必读》的编选思想及主要特色

傅宏星

(湖南科技学院 国学研究所, 湖南 永州 425100)

摘 要: 钱基博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和国学大师。他在 1924 年为中学生编选的《国学必读》一书, 纲举目张, 选文精审, 在考虑到当时中学生的实际能力和现实需要的同时, 也兼顾了各个朝代的文章, 成为当时影响较大、流传甚广的国学普及读物之一。钱基博特别强调文学可以“通国学之邮”, 故单独拈出《文学通论》作为上册。下册《国故概论》分别按通论、经学、小学、史学、子学来进行辑录, 体现了钱基博的“国学分类”思想。《国学必读》对今日之“国学热”或不失为一种反思和参照。

关 键 词: 钱基博;《国学必读》;经史子集;编选思想;国学热

中图分类号: C43

文献标志码: A

文章编号: 1009-2013(2012)03-0087-05

Main contents of Qian Ji-bo's *Required Readings for Chinese Classics* and its editing thought

FU Hong-xing

(Research Institute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, Hunan College of Science & Technology, Yongzhou 425100, China)

Abstract: As a famous educationist and master of Chinese cultur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, Qian Ji-bo compiled *Required Readings for Chinese Classics*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1924. The book was well-ordered in structure and strict-selected in writings so that it became one of popular readings to spread Chinese Classics at that time. Qian Ji-bo emphasized the key role of literature and edited *General Statement of Literature* as volume 1. Volume 2, *Introduc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* was edited according to the thought of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. The *Required Readings for Chinese Classics* is thought to be a kind of rethink and reference to today's Chinese Classics Craze.

Key words: Qian Ji-bo; *Required Readings for Chinese Classics*; Confucian Classics; editing thought; Chinese Classics craze

钱基博先生(1887—1957), 字子泉, 号潜庐、老泉, 江苏无锡人。现代著名古文大家、文史专家和教育家。历任私立上海圣约翰大学、国立北京清华大学、私立上海光华大学、国立南京第四中山大学、私立无锡国学专门学校、国立浙江大学、湖南国立师范学院、私立武昌华中大学等高校国文系教授, 或兼系主任、文学院院长等职; 全国解放后任华中师范学院(即今华中师范大学)历史系教授, 直至寿终。

20 世纪 20 年代初, 在北大国学门与“古史辨派”的共同推动下, “整理国故”运动迅速高涨。

作为传统文化研究与传承的重镇, 全国各大学文科纷纷成立国学研究机构, 影响所及, 甚至连大学入学考试也常有国学知识之测验, 且考题逐年增加。教育部遂鼓励当时的高级中学开设“国学概论”课程, 但必修、选修随意, 也没有指定统一的教材; 直到 1922 年 11 月新学制(即“壬戌学制”)课程颁布, 这门课才最终得以确立。《国学必读》即是钱基博先生为普及国学常识而编选的一部中学教科书, 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。《国学必读》分上下两册, 上册为“文学通论”, 凡收录三十七家文章四十五篇, 杂记六十五则; 下册为“国故概论”, 凡收录二十家文章三十六篇, 杂记三则。它自民国十三年(1924 年)四月付印问世以来, 流传江南各校, 深得高级中学普通科和师范科师生的欢迎, 影响非

收稿日期: 2012 - 06 - 20

作者简介: 傅宏星(1970—), 男, 新疆石河子人, 讲师,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。

常广泛。

其实,当年的“国学运动”,就是现在所谓的“国学热”。只不过彼“热”非此“热”,各有各的“情势”,各有各的“热”法而已。在当前这个“主编”满地走、选本满天飞的时代,要找到一本合适的国学选本其实并不容易。因为选本所显示的,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,倒是编选者的学养和眼光。在“国学热”经由电视讲坛进入百姓视野、传统文化过度娱乐化而国学常识极度匮乏的当下,笔者拟对昨天的国学运动倡导者钱基博的《国学必读》的编选思想及主要特色进行深入解析,以对当今的所谓“国学热”进行参照。

一、“文学通论”的编选思想

《国学必读》上册“文学通论”分为“古代文论”和“现代文论”两部分。

“古代文论”收录二十三家文章共二十六篇,杂记六十五则,均取材于书牍、笔记、序跋、论说,甄选极精,皆为牖启中学生辨章集部之源流正变。比如录清章学诚《文集》、恽敬《大云山房文稿二集叙录》,意在阐明集部之缘起。录梁昭明太子《文选序》、清李兆洛《骈体文钞序》、阮元《文言说》、方苞《古文约选序例》,则旨在究明文集类次之体要而穷其流变者。录清刘大櫟《论文偶记》五则、姚鼐《复鲁絜非论文分阴柔阳刚书》,以辨析音节之高下疏密和文气之阴柔阳刚。选文短小,读起来方便,消化起来也容易。哪怕片言只语,亦足以抉发文心,让初学者受益无穷。

“现代文论”收录十五家文章共十九篇。首先,选录了一组有关翻译名词的讨论文章,分别为清吴汝纶《与严几道论译西书书》、严复《译天演论例言》、胡以鲁《论译名》、容伯挺《致甲寅记者论译名》和章士钊《答容挺公论译名》。1914年11月,以章士钊、胡以鲁、容伯挺、朱自清等人为代表,掀起了一场“译名大讨论”。上列后三篇文章,反映的就是这场翻译史上的著名大辩论。它不仅奠定了中国翻译理论的基本格局,而且对此后现代汉语的发展,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其次,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,“文学革命”的实绩不容回避。选文以梁启超《中学以上作文教学

法》开篇,有的放矢,便于初学。继之以胡适《谈新诗》和《论短篇小说》二文,论及欧化的白话文、新诗、短篇小说。在理论探讨方面,胡适《文学改良刍议》与胡先骕《中国文学改良论》,胡怀琛《新派诗说》与蔡达《诗之研究》,可以看作二组具有论战性质的文章;论战双方虽略带意气,但各抒己见,态度还算客观公允。最后,辑录了一组通论性质的文章,涉及学科建设,分别为国语文法、修辞学、文学批评等,选文均可以作为20世纪曾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一份证言。

钱基博把“国学”类分为通论、经学、小学、史学、子学、文学六部分,其中文学不过国学之一,为什么单独拈出并作为一册呢?钱先生解释说:“先之以文学通论者;曾涤生有言:‘古圣观天地之文,兽迹鸟迹而作书契,于是乎有文。文与文相生而为字,字与字相续而成句,句与句相续而成篇,……古圣之精神语笑,胥寓于此。差若毫厘,谬以千里;词气之缓急,韵味之厚薄,属文者一不慎则规模立变,读书者一不慎则卤莽无知!’故知舍文学无以通国学之邮矣。题之曰国学必读,而不曰国文者,盖国文不过国学之一,而国学可以赅国文言之也;曰必读,谓非籀读此编,观其会通,未足与语于国学也。”^[1]由此可知,钱基博认为文学可以“通国学之邮”,是治国学的基础,同时他还指出,这些选文又是“必读”的,“非籀读此编,观其会通,未足与语于国学也”。^[1]

二、“国故概论”的编选思想

《国学必读》下册“国故概论”,分别按通论、经学、小学、史学、子学来进行辑录。

“通论”收录十家文章共十二篇,分别为夏曾祐《孔子学说》、梁启超《治国学的两条大路》、章炳麟《中国文学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达》和《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》、胡适《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》和《研究国故的方法》、刘文典《怎样叫做中西学术之沟通》、陈嘉异《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》、陈启天《中国古代名学论略》、樊炳清《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》、江亢虎《中国文化及于西方之影响》、钱基博《某社存古小学教学意见书》,都是通论性质的文章。这些选文内容

丰富,涉及国学的方方面面,比如:道、儒、墨三家学术之介绍,治国学的方法,学习国学的意义,中国古代名学概论,中西文化之沟通与互补,小学生阅读传统文化典籍之次第……等等,都是中学生学习国学所“必读”的。钱先生对此意趣最浓,所辑篇目也最多。

“经学”收录六家文章共六篇,以辨章经学之源流,为有志于经学的后来者指明了一条以贯通古今之法治经的门径。首录唐陆德明《经典释文叙录》,叙《六经》及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在先秦至两汉之间的授受传承,示经今古文学之显隐。钱先生一贯认为:“通经之法,要在明经传之别,通今古之殊。”^[2]据此,他又辑录了清龚自珍《六经正名》,以考证经传的沿革;复录魏源《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序》,所以明今古文家法之分殊及其学术流变。次录胡培翬《诂经文钞序》、陈寿祺《经郭条例》二文,叙述清儒治经的方法,以求“开设户牖,启示途辙”,^[2]真正起到了目录为学术研究导航的作用。末录钱基博《师范学校读经科教授进程说明书》,详细阐发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开设读经课程之旨趣,为研读经学的中学生打开了一扇窗户。作者指出:“师范学校之读经,其旨趣与大学文科之治经不同。盖大学文科治经之所以,在讲学,在董理国故。而师范学校之读经,则重经世,重修养人格。”^[3]

“小学”收录七家文章共七篇,杂记三则。小学是“审形声,明训诂”之学,所以钱先生辑录“国故概论”时将小学单列为一类。而读古经古书,必先识古字。识古字之形,晓古语之声,方能解古书之义。字类定于形,字义生于声。知古字之形声,才可辨今字形声之正误。因此,形声乃识字之本。故而辑录了清钱大昕《十驾斋养新录·论古书音读》三则、陈寿祺《汉读举例》,用以辨小学之音读。录江谦《古今音异读表序》、金可庄《声音学听讲录》,章炳麟《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》,揭示了中国古音的演变过程。众所周知,古音学的全盛期是清朝,虽然清代学者确认了先秦古音与后代语音并不相同,但对古音的声母问题,却很少论列;其间只有钱大昕做过专门研究,论定古无轻唇音与舌上音。章炳麟进一步论证古代“娘”、“日”二声母归于“泥”,确定古代声母为二十一个,从而推进了

古音学的研究。录梁启超《从发音上研究中国文字之源》,文中列出了许多说明“音近义通”的例证,从古语音之原以求古文字之原。录章炳麟《中国文字略说》,阐明文字学的内涵和流变。末录钱基博《吴江沈颖若先生文字源流后序》,以英文与中文进行比较研究,说明中西文字之“形声虽殊”,而“所以为传达言语之具者实同”,则扩展了研读小学的路径。小学的学术流变一目了然,学者可循此脉络上下求索。

“史学”收录三家文章共四篇。首录清龚自珍《古史钩沉论二》,所以探古史之源头。次录梁启超《五千年史势鸟瞰》和《历史统计学》二文:前者介绍了一种研究中国文化史的新方法——历史地理学,来说明地理环境“不徒在物的方面,而兼及心的方面;往往因地理影响,形成民族特别性格;而此种性格,递代遗传,旋为历史上主要之原动力……故治史者于地理之背景,终不能蔑视也”。^[3]后者则介绍了另一种研究中国史的新方法——历史统计学,1922年,梁启超首次提出“历史统计学”的概念,这使他成为中国本土最早倡导历史统计学的史学家。而且,他还身体力行,在历史文化地理和佛教史等领域的研究中卓有成效地加以运用,同时又提出了许多研究的设想。梁启超对历史地理学和历史统计学的倡导与实践,对20世纪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,使得这两门新兴学科的运用几乎成了一种学术时尚;尽管,人们对其评价并不完全一致。如今重读旧文,仍给予人们许多启迪。末录柳诒徵《正史之史料》。此文发表于1923年3月的《史地学报》,当时正值“疑古思潮”风起泉涌之时,柳诒徵不仅考察了正史之前、一家所撰史书、众手所修史书等三类史料的来源,而且对疑古派治史学的方法与某些偏颇的结论表示了怀疑,并率直地提出了批评:“要之史书无一事无来历,其小有出入,乃一时之疏,非故意以误后人,不得执一以疑其百也。今不务考其本源,而凭空言出私见,冀以补其遗而正其讹,吾不知其可也。”^[3]

“子学”收录五家文章共七篇。读子部之书,不可不知诸子之起源与派别以尽其学术流变。首录夏曾祐《周秦之际之学派》、章炳麟《论诸子的大概》,究明诸子学之所自起。晚清以来,西学东渐,

墨学中兴,诸子学因之风靡一时,后生小子,惟新是鹜,声气标榜,无不奉胡适《诸子不出于王官论》以为圭臬。作为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之骨架的“诸子不出于王官论”,是胡适的一大创见。此学说的建立,根于“进化论”的观念,借助了晚清经今文家说和杜威式的实用主义,推翻旧说而取代之,从而开创了关于诸子学起源的自由解释之风气,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界中的“疑古”、“释古”、“信古”各派均有深远影响;并最终导致传统文化式微,经学一变而为子学之附庸,最终又使子学成为“中国哲学史”、“中国思想史”。面对时贤好为疑古,不思“综贯史志”,但执己见,坐儒家以万恶之名,学术之迹因以不明,柳诒徵发表了《论近人讲诸子学者之失》一文,针砭时弊,逐一辩驳。文末略云:“吾为此论,非好与诸氏辩难。只以今之学者不肯潜心读书,而又喜闻新说;根柢本自浅薄,一闻诸氏之言,便奉为枕中鸿宝,非儒谤古,大言不惭;则国学沦胥,实诸氏之过也。诸氏自有其所长,故亦当世之学者。第下笔不慎,习于诋诃。其书流布人间,几使人人养成山膏之习;故不得不引绳披根以箴其失。至于所言之浅俚,故不值海内鸿博者一晒也。”^[3]后来者眼明,庶几不负柳先生的良苦用心。未录江山渊《论子部之沿革兴废》、《论九流之名称》、《论道家为百家所从出》三文,以阐明九流十家之分殊和流变,以及道家“上接史官之传,下开百家之学”的特殊地位。

“国故概论”分别按通论、经学、小学、史学、子学来进行辑录可以看作钱先生“国学”分类思想的最早表述。“通论”不能名学,再加上单独成册的“文学概论”,似乎可称为国学的五分法。1925年4月,钱先生发表《“古书治要”之教材举例》一文,将“古书治要”(即校讎学)课程之教材分为六类:曰小学源流,曰经部源流,曰子部源流,曰史部源流,曰集部源流,曰古书源流。他对第六类“古书源流”的解释是:而终之以“古书源流”,则所以观其会通明其关系,而“辨古书部次类例之大凡”者也。^[4]可看作国学的五分法向六分法过渡的一种说法,与《国学文选类纂》的分类并不矛盾。1926年,钱基博先生编撰《国学文选类纂》时,则将“国学”明确分为六类:“曰小学之部,曰经学

之部,曰子学之部,曰史学之部,曰文学之部,曰校讎目录之部”;不仅延续了五分法的基本类目,而且还增加了“校讎目录学”,故可称为国学的六分法。让人心生疑问的是,两种国学分类思想,哪一种才是钱先生的成熟看法呢?如果五分法仅仅是考虑到中学生初涉国学殿堂,对于他们来说,校讎目录之学又实在是过于艰涩了,所以才决定不选这类的文章。那么,矛盾自然也就不成立了。如果不然,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:钱先生对国学分类的认识,也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。

三、《国学必读》的编选特色

钱基博的《国学必读》无疑是一部值得推介和认真研究的经典选本。《国学必读》结构合理,纲举目张,选文精审,难易适度,选文非常精粹,考虑到了当时中学生的实际能力和现实需要,上册“文学通论”目的是使学生“读之而古今文章之利病,可以析焉”;“国故概论”是使学生“读之而古今学术之源流于是备焉”。因为中学生基础有限,要学的东西又太多了,如果不善于引导,所选文章要么艰涩而阻进学之途,要么东抓一把,西抓一把,漫无系统,效果未必就好。所以,选文过程中既要考虑知识系统的合理搭配,又要考虑中学生的实际需求,深入浅出,才能学有所成。

《国学必读》不但对各朝代的文章兼收并蓄,而且兼顾了传统的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之学。选文上起三国魏,下至民国,有一千七百年的时间跨度,各个时代(除元朝)都有文章入选,而又突出了清代和民国。清代在上册入选二十四篇,杂记五十四则,占十分之五六;在下册比重骤降,只入选六篇,杂记三则,还不到十分之二。民国在上册入选十五篇,占十分之三;在下册比重猛增,入选二十九篇,占十分之七八。笔者以为,钱先生这样处理是非常恰当的。因为传统的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之学,在清代大都获得了长足发展,取得过骄人的成绩。尤其是古典诗文演变到了清代,体裁和风格已经非常完善和成熟;而对古典诗文的精细研究,尤以桐城派诸大家为翘楚。所以研究国学,不可抹煞清代学术的既有成果。进入民国后,伴随着儒学式微,欧化之风渐强,其中经学日益被边缘化,直至消亡;史

学则“借尸还魂”，出现了一种畸形的繁荣局面；在西方学术体系无情的冲击下，子学的下场最为悲惨，不仅名号被消解了，而且不得不按哲学史、思想史、学术史等西学范式进行分科改造，削足适履，面目全非，子学完全丧失了自身的中国特色；与子学比较而言，集部之学的遭遇也不见得好多多少，一变而为白话文学，再变而为革命文学，损失的不仅仅是古典文学这座“半壁江山”。遥想当年，陈独秀、胡适等人借助“新文化运动”这面大旗，白话文运动先行，继而提倡新诗、白话小说、平民文学等等——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——“文学革命”干得真是轰轰烈烈。到了1920年，除了全国各大报刊改用白话之外，教育部又颁令初小“国文”科改为“国语”科，白话文学如愿以偿取得了“文学正统”的地位。而“整理国故”运动，实际上更多偏重于史学。所以，对于编选者来说，不可能漠视民国学术的最新成果和发展走向。

与许多民国选本一样，该书也有一个“作者录”，置于分册目录之后，言简意赅，恰似一篇篇精彩的作者小传，颇具特色。比如李兆洛条曰：“时论盛推方、姚，崇散行而薄骈偶，崇八家而轻六朝。而申耆则以为唐宋作者，无不导源汉魏；汉魏之骈偶，实唐宋散行之祖；辑《骈体文钞》七十一卷，以当桐城姚氏之《古文辞类纂》。于是阳湖派别张一军，与桐城抗颜行矣！”^[1]笔势雄健，意气凌云。再比如章炳麟条有曰：“其治小学，以音韵为骨干。谓文字先有声，然后有形；字之创造及其孳乳，皆以音衍。其精义多先儒所未发。”^[3]评鹭精当，赞赏

之意溢于言表。又曰：“虽然章氏谨守家法，而门户之见，时不能免。如治小学排斥钟鼎文、龟甲文；治经学排斥今文派。”^[3]钱先生秉承史家传统，不替贤者生者讳，直斥章氏治学之非。又比如柳诒徵条曰：“而柳氏不徇众好，独以为古人古书不可轻疑。章氏比之‘凤鸣高冈’。其为人美须髯，善谭议。治中国史学尤精洽，采摭极博，而议论有裁断。”^[3]寥寥数语，就将柳先生为人为学之风格神采，刻画无遗，栩栩如在目前。

不过，《国学必读》也有个别类目的选文不尽如人意。比如“小学”部分的选文，就过于偏重音韵学而疏于文字学、训诂学方面的内容。好在《国学必读》出版后不久，钱基博先生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。故而 he 编撰《国学文选类纂》一书时，特地有针对性地调整文字、音韵、训诂三部分选文的比例，弥补了缺憾。《国学必读》与《国学文选类纂》相为表里，对读最佳。陶渊明有句云：“悟已往之不谏，知来者之可追。”由于此书出版太早而甄选不够全面，或尚不足以为病乎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钱基博. 国学必读：上册[M]. 上海：中华书局，1924.
- [2] 钱基博. 国学文选类纂[M]. 上海：商务印书馆，1931.
- [3] 钱基博. 国学必读(下册)[M]. 上海：中华书局，1924.
- [4] 钱基博.“古书治要”之教材举例[J]. 新教育，1925(3)：25.

责任编辑：曾凡盛